



## 大会

正式记录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

第一四三五 次会议逐字记录  
1994年7月13日,星期三,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洛希亚先生.....(巴布亚新几内亚)

主席缺席,由副主席雷米雷斯·德埃斯滕诺斯·巴尔谢拉先生(古巴)主持会议。

上午10点25分开会

东帝汶问题(A/AC.109/1187)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关于此项目,委员会面前摆着秘书处编写的工作文件(A/AC.109/1187)。

委员会根据第1431次会议所作的决定将于今天听取请愿人的发言;我们已经准许了他们的请求。

我首先要求各位请愿人记住,口译员为我们提供五种语言的同声传译,并考虑到他们的速度和讲话方式。我请各位请愿人不要讲的太快以确保口译正确。

鉴于东帝汶问题吸引了多达28人的最大数量的请愿者人数,并导致就这一问题召开两次会议,同时为了确保所有那些要求并已经准予听询的人今天有机会发言,我进一步请求各位请愿人--这丝毫不与我的第一项要求相矛盾--尽可能的简明扼要,即便是谈及他们认为是最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在请愿人不给于这种合作的情况下,很可能发生的是,并非所有请愿人都会在委员会关于本项目的两次会议上获得听询的机会,而我们认为,他们所有人都应当有机会发言。

第一位请愿人是帝汶民主联盟的弗朗西斯科·尼科劳先生。

在主席邀请下,弗朗西斯科·尼科劳先生(帝汶民主联盟)在请愿人议席就座。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请尼科劳先生发言。

尼科劳先生(帝汶民主联盟)(以英语发言):几十年来,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仍然未得到解决,这些问题涉及一个组织的会员国持续和有系统的对人权侵犯;而该组织于1948年就宣布了这些权利所具有的普遍性,而这些权利赖以存在的核心就是在这个地球上共同生存的所有文明国家对最根本的和基本的人权的尊重。恰恰是由于这种侵犯行为的存在才有必要保证某些至关重要的委员会会继续存在下去,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就正是这样一个组织。如果各国变得成熟并从而排除本委员会存在的理由的话,该委员会与大家一样会获益匪浅。

不用推理便看出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差别:在帝汶的东部,印度尼西亚的国家政策仍允许和宽容一切形式的侵犯人权并且表明在助长成熟和非野蛮行为方面缺乏实际行动。

与此相反的是,印度尼西亚在维也纳达到了其政治伪善的最高点;它含糊不清的对诸如实体完整、言论自由和

生命自由等权利进行辩护，而所有这些权利是被人类良知奉为神圣的，不论它们来自那个地理区域、性别和种族。

帝汶人民在其反对印度尼西亚自1975年以来的入侵进行的合法抵抗方面始终是毫不动摇的。帝汶民主联盟（帝汶民联）为配合这种情感通过在里斯本召开的一次大会进行了改组，它将该党重建以使其在对付印度尼西亚的持续侵略和应付任何未来挑战方面变得更加有效，特别是涉及一旦举行全民投票在捍卫我们人民各项权利方面的那种挑战。

帝汶民联是东帝汶具有历史性的民族主义党派。在印度尼西亚企图推行帝国主义方面它从未与该国进行过协作。与印度尼西亚所宣扬的关于帝汶民联具称于1975年在巴厘博所签署的文件一事相反，帝汶民联拒绝被征服或被合为一体。

即便随着时间的推移，帝汶民联仍继续坚定地捍卫成为其1975年建立的基础的各种基本价值观念和原则。尽管资源有限，它从未在其不断捍卫帝汶人民的自决和独立权利当中产生过动摇。帝汶民联不仅通过该党的新生化，而且也通过采纳一种更适合当今现实的组织结构得到了活力。

遗憾的是，帝汶民主党的力量不足以限制印尼武装军队犯下的野蛮行径。侵犯人权行为继续存在，几乎是作为这些权利绝不会回到东帝汶的一种断言。例如，潘特利奥·阿玛拉尔，年18岁，1994年7月23日被拘禁在帝力，杜阿尔特·希门内斯，年17岁，遭受酷刑，塞巴斯蒂瓦·弗拉加·弗雷塔斯自从1991年11月起失踪，马切罗，一个小男孩，1994年5月6日被第744/717营杀害。这些例子都说明共同的规律：印度尼西亚要在东帝汶和其他岛屿继续征服人民。

然而，总有一天苏哈托总统会接受历史教训，然后非殖化进程——由葡萄牙开始而被印尼入侵该领土所突然中断——将转变成帝汶人民根据文明国家所接受的模式而不是根据印度尼西亚所推行的模式去行使他们自决权的自由，因为那时也只有那时和平、正义和自由将在东帝汶获胜。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阿尔瓦·韦尔先生（何伯特东帝汶委员会）在请愿者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韦尔先生发言。

韦尔先生（何伯特东帝汶委员会）（以英语发言）：我代表何伯特东帝汶委员会发言。

和希望东帝汶实现和平与正义所有人一样，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在印尼入侵后19年还没有实现一个解决办法，我们要

求联合国象对待其他入侵局势一样愿意实行强硬措施，包括制裁，以求所有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决议得到遵守。

我们谨简单发言，谈谈使印度尼西亚在1975年入侵东帝汶的原因和这些原因目前在多大程度上仍然影响着谋求和平。

1975年宣传最广的说法是，东帝汶正在“倒向共产党”。但是即使出现某些奇迹，东帝汶的68万人民每一个都在20个月的时间内“倒向共产党”，那对具有千百万共产党的印尼也影响很小。

1974年印尼开始其使东帝汶动荡的秘密计划并在这一计划不成功时，入侵东帝汶。这一计划是在东帝汶的两个主要政党和谐和富有成果地为独立的共同理想而合作时制定的。

澳大利亚驻东帝汶前领事詹姆斯·邓恩的笔下曾经这样描述这一时期：

“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存在的轻松和快乐的气氛以及政治上活跃的帝汶人之中的容忍和乐观精神不能不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有根据表明印度尼西亚担心东帝汶正在“实现独立”，而不是正在“倒向共产党”。然而，如果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亚当·马立克先生在1974年向东帝汶保证算数的话：

“独立后不管谁治理帝汶都可以确信印度尼西亚政府将永远自立于维持良好关系、友谊和合作，以使两国都得到好处”。

那么东帝汶的和谐应使人们感到高兴。

1975年，印度尼西亚的周围地区——西帝汶、阿洛、安汶、韦塔等等——是印度尼西亚最贫穷和最受忽视的地区。大量的援助流入印度尼西亚，但是其中很少给予外围岛屿。很容易发现得不到治疗的麻风、疟疾和结核病例。有的学校没有职工和书籍，有的岛屿没有铺了路面的道路或码头。

雅加达认为一个独立的有资格取得联合国和双边广泛援助的东帝汶是一个危险，因为它会使目前在南摩鹿加群岛和附近岛屿的不满情绪恶化。但是，解决这一潜在问题的办法不在于入侵东帝汶而在于更尊重和支持印度尼西亚最受忽视地区的人民的愿望。

当澳大利亚海外援助理事会1975年底评估东帝汶局势时他写道：

“今后为维持东帝汶独立所需的实际外援量将是很少

的,至少同诸如印度尼西亚这样一个国家相比是如此,印尼今年将需要28亿美元的贷款和赠予”。

印度尼西亚能在入侵东帝汶的费用方面找到几百万美元,但是找不到钱为在东帝汶的许多麻风病人提供达普宋治疗。

人们广泛认为印度尼西亚要东帝汶以便利用它作为训练场所,而它在入侵前和后的行为都支持了这一看法。

当印度尼西亚在60年代初,根据苏哈托少将--现任总统--的策划开始向荷属新几内亚空投伞兵时,那成为一场败局。土著人民宁愿支持荷兰的努力准备在十年的时间内取得独立,而不相信印度尼西亚的说法并干脆把捕获的印尼军队交给荷兰当局。但是当美国选择支持印度尼西亚而不是荷兰时,那就成为一个外交上的成就。

可以理解,印度尼西亚然后就开始计划接管北婆罗洲。在这一作战计划中,苏哈托再次起重大作用。但是英国选择支持年轻的国家马来西亚,于是这场战役就成为军事和外交上的败局。

可以理解,苏哈托和他的将军们把东帝汶这个小国看作印度尼西亚军方恢复声望的手段。东帝汶没有海军也没有空军,陆军只有5 000人。事实上,印度尼西亚陆军动员的总兵力比东帝汶全国人口还多。印度尼西亚军方对于成功如此自信,它向东帝汶散发传单说它将在五天中控制该国。

1975年,葡萄牙同南非一样,被不结盟世界认为是“罪恶帝国”,因为它企图保住其非洲殖民地。苏哈托总统可以通过看似在帝汶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提高它在不结盟运动内的地位。但是,遭到轰炸、枪杀、燃烧弹攻击、拷打、强奸和恐吓的并不是葡萄牙殖民者,而是东帝汶土著人民。非洲葡语国家的永久的功劳就是坚持不懈地努力克服这种错误观念并促进东帝汶人民的自决权。

美国和澳大利亚情报机构监测了印度尼西亚秘密的破坏和入侵计划的每一步,这已不再是秘密,但是他们没有做任何企图阻止印度尼西亚或在联合国内提出这一问题,而是实际上支持、鼓励和帮助资助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的野蛮占领。1975年在雅加达的一个中央情报局间谍曾经透露,除了武器之外,美国还提供了士兵服装之类的物质。

不难理解的其中道理。美国在印度之那面临失败和撤退。印度尼西亚向其提供了同军事胜利发生联系的机会,以及有机会被看作是一个仍然有效的反共斗士。那么这些理由

中那一条仍然是障碍?

苏哈托总统尽管在东帝汶、西巴布亚和亚齐进行屠杀,无视安全理事会两项决议,还是实现了成为不结盟运动领袖的野心。不管他和他的将军们对以往的军事失败如何感受,他们必须清楚地知道,屠杀东帝汶手无寸铁的人民不会带来任何军事荣誉。但是东帝汶仍然是一个训练场所,是迅速晋升的一种方法,是印度尼西亚军方以各种措施增加其工资的方法。

被列为共产主义者的印度尼西亚人的数量超过了东帝汶的总人口,因此,显然东帝汶对印度尼西亚所认为的共产主义威胁没有任何影响。印度尼西亚东部岛屿的贫困只得到了微不足道的解决。仍然不难找到未经治疗的麻疯病、虐疾和肺结核,有些村庄仍然没有干净水或卫生设备,仍然有些社区只能得到最少的教育机会。

印度尼西亚声称它在发展东帝汶。1966年,一些捐助国--关于印度尼西亚问题政府间集团--同意向印度尼西亚提供5亿美元,以帮助克服“苏加诺年代的混乱”。从那以来,印度尼西亚每年需要的援助额一直上升,目前达到每年超过50亿美元。当印度尼西亚自己对外来援助的需要是如此之大时,它是否有钱发展东帝汶是很成问题的,通过印度尼西亚的官僚机构向东帝汶提交这一援助的一部分是向东帝汶提供援助的效率极低和不适当的方法。

美国已经开始撤回对印度尼西亚军方的道义支持和实际援助,印度尼西亚因有关东帝汶的问题而不感到窘迫的地方越来越少。

在东帝汶内部,印度尼西亚确保抵抗将继续下去,因为留给东帝汶人民的唯一真正东帝汶的东西就是他们为争取自己的特征和独立所进行的斗争。印度尼西亚人正在掠夺东帝汶土地;东帝汶财产经常被印度尼西亚军队“没收”;印度尼西亚现在控制了东帝汶的所有资源;东帝汶语言被禁止;东帝汶文化被破坏和受到嘲笑;东帝汶家庭和社区被拆散和财产被剥夺,甚至东帝汶教会正在被迫接受印度尼西亚牧师。

有许多充分的理由说明联合国为什么应当象在柬埔寨、波斯尼亚和其它地方一样积极地在东帝汶活动。也许在这个国际家庭中,可以更多地注意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曾经是富有和相互支持的家族、家庭和社区结构的破坏。

1976和1977年对马特比安的包围同波斯尼亚发生的任

何情况一样恐怖,但是,没有新闻界去拍摄电影,联合国没有进行积极的干预。相反,此后发生了大规模饥荒、残酷的“腿篱笆”运动、克拉拉斯和拉克卢塔的屠杀、把大量人口强行从其传统土地赶走、蓄意对至少200名帝汶儿童下毒。1991年,当全世界看到帝力屠杀时,我们获悉这次惨剧发生在联合国接管东帝汶非殖的责任30年之后,安全理事会具体要求:

“印度尼西亚毫不拖延地从该领土撤出其军队”(第389(1976)号决议,第2段)

的16年之后。

请愿者退席。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提醒各位请愿者,如果他们不发表简短的发言,我们很可能没法让他们所有人在委员会发言。

我谨通知委员会成员,菲律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代表团已经要求参加特别委员会对东帝汶问题的审议。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委员会接受这些请求。

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阿拉雷先生(菲律宾)和费雷拉先生(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在委员会议席就座。

#### 要求听证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提请各位成员注意第19/94 Add.1号备忘录,内载听证的请求。

纳赛尔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谨再次表示其对这一问题的立场。

至于1994年7月7日第19/94号文件所载的特别委员会的备忘录,其中包括要求作为请愿者就所谓东帝汶问题发言的个人和组织的听证请求,我谨转告我国代表团的如下立场。

东帝汶的非殖化进程已经按照《联合国宪章》条款和大会第1514(XV)和1541(IV)号决议进行完毕。从而结束了该前领土的殖民地位。

因此,1976年7月17日东帝汶正式并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为它的第27个省,享有同其它各省份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重申其坚定的意见,即把所谓的东

帝汶问题保留在本委员会的议程上,结果本委员会准许请愿者发言,这是没有道理的,因此是不能接受的。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印度尼西亚代表的发言将反映在会议的记录上。

在此谅解基础上,如果委员会成员没有别的话要讲,我是否可以认为,委员会同意准许这些新的要求听取发言的请求?

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孙苏埃洛·比拉努埃瓦女士在请愿者席位就座。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大赦国际的孙苏埃格·比拉努埃瓦女士发言。

比拉努埃瓦女士(大赦国际)(以英语发言):在过去10年中,大赦国际每年都来到本委员会面前阐述它对东帝汶人权问题的关注。我们每一年的批评主要都是针对印度尼西亚政府的,近20年来,该政府的政策和做法直接造成了该领土上有系统践踏人权的行。今年,我们感到有必要打破这一传统。我们今天的话不仅是针对印度尼西亚政府的,也是针对联合国会员国的。我们认为,对于东帝汶长期的人权问题,联合国会员国直接或间接地也有责任。

去年,我们在本委员会上发言,欢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通过一项关于东帝汶问题的决议,我们表示,希望联合国各会员国急需促使印度尼西亚政府执行该决议中所载的各项具体建议。我们相信,通过这样做和坚持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遵守国际人权标准,联合国会员国可以为改善该领土上的人权状况作出重要贡献。

可惜,1993年决议通过以来一年半,国际社会实际上已把东帝汶境内有系统的践踏人权的现实置之不顾。它已不加批评地接受了印度尼西亚政府致力于人权和“政治开放”的承诺。但最近几星期,它禁止该国三家主要新闻杂志,采取压迫性措施,包括任意拘留和虐待,以镇压有勇气站出来反对它们的人,充分暴露了那些承诺空洞无物。对急于相信印度尼西亚政府所谓新的“开放气氛”的宣传的人来说,这些措施可能使他们感到意外,但这对大多数东帝汶人

来说,这并不新奇。1993年9月,东帝汶天主教主教东·卡洛斯·菲利普·希门尼斯·贝洛曾经这样说:

“人民不能表示不同的意见,持不同的观点……他们也被剥夺了表达他们的政治希望的基本权利……军方说他们不打人,他们尊重人民,他们为了人民的繁荣而努力。但对我来说,这纯粹是撒谎。从1983年到现在,我从他们那听到的只有谎言。”

许多国家的政府虽然公开表示关注东帝汶的人权状况,但却继续向印度尼西亚提供军事装备,这些装备可被用来在东帝汶践踏人权。其它国家则提供军事训练,或同践踏人权臭名昭著的印度尼西亚部队,进行联合演习。虽然有些政府已把经济援助同人权表现挂钩,但大多数援助捐赠国却不断增加它们对印度尼西亚的援助。而且,关注人权问题的表示对贸易做法没有任何明显的影响。外国政府愿意照常行事,这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即经济利益高于人权。

在过去一年中,由于缺乏来自国际社会方面的协调的压力,已促使东帝汶境内一种有规律、有系统的践踏人权的状况持续下来。酷刑和虐待继续是一种封杀真正和嫌疑政治反对者和通过恐吓的威迫取得政治情报的战略的核心手段。仍有报道不按法庭程序处决的情况。而在过去几年中被杀或“失踪”的人的命运,至今没有澄清。在过去一年中,按照一种明确固定的模式,数百名作为政治反对者被任意拘留,而且,至少有23人经过不公正的政治审判后,现在正在坐牢,高的可达终身监禁。

尽管印度尼西亚政府公开承诺保护人权,但它几乎不调查过去违反人权的行爲,也没有采取重要措施,预防今后重新发生。军事当局继续主导政府,他们的行动有很大的自主权,而且极少顾及人权。犯下侵犯人权罪行的人都逍遥法外,很少例外。而且,尽管政府一再声称增加了开放性,然而,接触东帝汶的机会仍然有限。

今年3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宣读的《一致声明》,就是国际社会对印度尼西亚姿态软弱的缩影。尽管印度尼西亚政府完全没有执行以前各项决议,特别是委员会1993年决议中提出的任何一项具体建议,但是,《一致声明》仍赞扬该

政府为保护人权而采取的没有具体说明的“积极措施”。去年继续发生践踏人权行为的情况,严峻地说明了这样一份软弱的声明所带来的内在危险。事实上,同某些政府声称的相反,《一致声明》不但没有鼓励印度尼西亚当局改进他们的人权作法,反而鼓励他们保持现状。

大赦国际认为,委员会的声明在四个重要方面有缺陷。第一,声明不提政治拘留犯的酷刑和虐待问题,尽管就在委员会开会期间,大赦国际仍报道继续有系统地使用酷刑和具体的酷刑事件的事实。同样令人震惊的是,委员会没有提到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1991年后期访问东帝汶和印度尼西亚之后提出的各项建议。在这次访问两年多之后,印度尼西亚当局仅仅开始执行其中一项建议。委员会不明文提到酷刑或特别委员会的建议协助确保情况毫无变化。正如声明所附的事实显示,酷刑继续在东帝汶发生。

第二,声明在谈到东帝汶的政治犯问题时,明显地避而不谈在过去三年中因非暴力的政治活动或信念而被囚禁的30多人,包括去年一年囚禁的6个人。声明也没有指出,近年来,数百名其它据称批评或反对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的统治的人遭受短期的任意拘留,但却没有罪名或审判。事实上,声明有气无力地请印度尼西亚政府确保囚犯得到“人道的待遇”,他们的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委员会似乎没有认识到,任意拘留根本上不符合人道待遇的原则和对基本权利的尊重,而维护这些权利正是委员会的职责。委员会还没有指出,作为一种原则问题,那些因非暴力的政治活动或信念而被拘留的人们,应该被立即或无条件的释放。

第三,关于未按法庭程序处决和失踪的问题,委员会的声明,在该问题在东帝汶境内的严重程度和性质上,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委员会承认为查清在圣克鲁斯大屠杀后失踪人士的下落所作的努力的说法,掩盖了政府的反应不足的情况。正如大赦国际在委员会1994年届会期间报告的那样,政府只澄清了估计270名死亡者和200名“失踪者”中很小一部分人的下落,而且,政府发表虚假和错误的情报,企图掩盖其努力之不足。

此外,印度尼西亚政府声称,这项屠杀是一个孤立事件,

它不能反映官方的政策或一种形成惯例的作法,委员会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1991年11月被杀害的人身上,是在给这一说法提供佐证。圣克鲁斯大屠杀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这方面最明显的证据是,自1991年以来据报在东帝汶发生了很多政治屠杀事件,仅在去年一年至少就有20件。

委员会欢迎它所称的扩大国际人权组织和人道主义组织以及国际新闻媒介进入东帝汶的机会的政策。这使人民对那里的人权情况产生一种非常错误的印象。事实是,访问东帝汶的所有代表团继续受严密监视,使得真正的人权监督难以实现,而且可能给代表团接触的那些人带来危险。正如这份声明所附的证据表明的那样,仅在去年一年就有许多东帝汶人由于收集和传播有关该领土侵犯人权行为的资料而被监禁、遭受酷刑和受虐待。因此,虽然印度尼西亚政府决定邀请调查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擅自处决的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在1994年7月访问东帝汶的决定无疑是一个积极的步骤,但人们依然关注,这些障碍和危险将限制特别报告员进行彻底和公正调查的能力。最后,必须强调,尽管印度尼西亚政府声称已经“扩大机会”,但是包括大赦国际在内的一些国际人权组织仍然完全被拒绝进入该领土。

在过去十年里,大赦国际每年都来到本委员会作证,它真诚希望它是最后一次作证。但是十分明显,如果印度尼西亚政府不立即采取具体步骤,处理侵犯人权行为的根源,如果联合国各会员国不协同一致地给该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它履行国际法规定的职责,那么在今后许多年里,我们还得回到这里。

请愿者退席。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如果没有委员会成员希望发言,我谨重复我们对今天出席会议的请愿者的要求。尽管他们必须使发言尽可能减短,但还必须以适当的速度发言,以使口译员能够作好翻译。如果象今天上午的一些人那样说的过快,那么口译员就无法翻译。

每一份完整的发言都将印发给委员会所有成员、新闻机构和秘书处所有成员。因此,我们请各位请愿者尽量选出发言稿中他们认为最重要的部分,在今天上午以适当的速度念

出来以使口译员作好翻译,让每个人都能在委员会行使发言权。

应主席邀请,夏龙·斯卡夫女士(东帝汶警戒网/加拿大)在请愿者议席就座。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请斯卡夫女士发言。

斯卡夫女士(东帝汶警戒网/加拿大)(以英语发言):我的名字叫夏龙·斯卡夫,我代表东帝汶警戒网/加拿大这一基层组织。该组织在加拿大15个城市都设有分部。该组织出席本委员会的听询会是为了表达加拿大人对东帝汶目前悲剧的关注。

我们组织开展的活动之一是对加拿大政府和议会成员继续游说,争取使加拿大对印度尼西亚的对外政策更加重视人权。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我将简单地作一概括。

加拿大政府指出,人权方面的问题是它对外政策不可分隔的一部分。为些,克里第安总理在1993年11月于西雅图会见苏哈托总统时表达了他对东帝汶侵犯人权问题的关注。

但是,加拿大所表示的关注最明显地反映在它的援助政策中。在1991年帝力大屠杀后,加拿大终止了已计划的三项援助项目,价值总额达3千万美元。去年11月,加拿大通知印度尼西亚政府,它决定同它的发展方案中撤销这三个项目。今年五月,由于加拿大公民对印度尼西亚政府在东帝汶大规模屠杀行动提出的人权方面的强烈批评,印度尼西亚政府取消了加拿大在苏拉威西岛的一个价值总额达3800万美元的援助项目。这两个例子可以最好地反映加拿大政府正在听取加拿大公民表示的关注。

最近,我有幸参加了在菲律宾举行的亚洲-太平洋地区东帝汶问题会议。我在会上从妇女的遭遇的角度谈论了东帝汶侵犯人权的问题。我不是一位东帝汶妇女,我不自称代表她们发言,我只想占用一点时间提请注意我发现的一些情况。

从印度尼西亚的非法占领和大规模屠杀行动对东帝汶妇女的具体影响角度可以把她们分为二类,即进行积极抵抗,也就是说参加东帝汶民族解放军的妇女和进行消极抵抗的妇女。我想重点谈谈第二类,即消极抵抗的妇女。这一类

妇女又可分为二小类,第一类是直接受害的妇女,第二类为间接受害的妇女。

东帝汶妇女直接受印度尼西亚侵略之害。成千上万的妇女被谋杀、强奸、遭受性攻击、受酷刑和绑架,并被强迫绝育。我不可能谈到东帝汶妇女经历的所有恐怖,但我想简单地概述一下东帝汶妇女具体遭遇的一些罪行。

有许多妇女被迫成为驻扎在东帝汶的印度尼西亚军人的当地“妻子”,这是有案可查的。这导致怀孕生下小孩,孩子是父亲是强迫接受的丈夫。

还有一些妇女在家人的面前被印度尼西亚士兵强奸。对东帝汶人民来说,比身体上的痛苦更严重的是精神上的折磨—人民遭到污辱并被剥夺尊严。许多人质问印度尼西亚军官:“你们难道没有母亲姐妹吗?你们知不知道人意味着什么?”以前曾是区神父和帝力主教助手的马蒂诺·达科斯诺·洛佩斯教长叙述道:

“多年来不分白天黑夜都有人来敲我的门,他们低声说着可怕的事情。从1975年开始,主教的住处有很多女孩来避难。科马卡监狱的妇女都遭受过强奸和虐待。在我们与他们谈话时他们告诉我这一情况。我们不断听到女孩遭到士兵强暴。印度尼西亚人往往不把东帝汶人,尤其是女孩当作人,而是玩具。他们看到他们想要的漂亮女孩后并对他进行玩弄,然后就弃之不顾,就象小孩玩玩具一样。”

许多东帝汶妇女在被拘留时,无论是在被警方扣押或是在监狱中被拘禁时都遭到强奸和性攻击。这种强奸往往造成怀孕。

1985年,在帝力建立了一个由世界银行提供资金的计划生育中心。到那时,在东帝汶的442个村子里已经有183个村子设立了计划生育中心。东帝汶大力推行的方案是印度尼西亚政府的计划生育方案。

在东帝汶和其他地方推行的避孕办法包括避孕套、口服避孕药、注射荷尔蒙、宫内避孕环和植入药物,但是在东帝汶,使用注射器特别是“Depo Provera”的比例高于印度尼西亚。不难理解作为一项既定目标方案的人口控制与所推行

的避孕办法之间的关系。计划生育机构不喜欢避孕套和避孕药因为其效果如何取决于个人的决定,宫内避孕环和植入药物的办法被认为是十分有效,因为它们只能由受过训练的医务人员插入和取出。“有效”是“使用者控制力低”的同义词。一种有效期长达五年,能够长期起作用的荷尔蒙避孕植入药物“Norplant”与宫内避孕环和绝育办法一道被称为是“最有效的避孕办法”。

在任何节育方案中“知情者的同意”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是侵犯人权。后来移居到葡萄牙的一些曾经目睹东帝汶妇女被注射药剂的东帝汶护士说,“知情人的同意”这一点往往没有作到。这些护士说,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从来没有告诉妇女给它们注射的是避孕药。有这样一个具体例子一些中学女生在它们不知道的情况下被注射了“Depo Provera”。

很难拒绝参加这些计划,因为村长被强烈要求进行合作,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计划作为准则强行实施,在那里,地方节育诊所处于军方监督下。东帝汶妇女几乎不可能抗议强制性节育。东帝汶村庄在印度尼西亚军方的实际控制下,抗议强制性注射将使自己容易遭到处决或失踪。

一位负责东帝汶节育计划的世界银行官员说

“尽管在开始执行这项计划时可能发生过度行为或强迫的情况,现在印度尼西亚卫生官员正在执行恰当的指导方针”。

非政府印度尼西亚计划生育协会说,它在东帝汶没有一个项目,因为“那里不具备实行计划生育的条件”。

由于自印度尼西亚1975年入侵以来已有20多万东帝汶人被杀死,印度尼西亚政府不可能说存在人口过剩问题。事实上,印度尼西亚推行的种族灭绝政策如此有效,联合国于1989年向苏哈托总统颁发了联合国人口奖。

将东帝汶出生率保持在最低水平的另一项有效方法是让医院工作人员杀死新生婴儿,因为孩子的父母被怀疑属于革阵。由于医院工作人员的这些和其他弊端劣行,应当指出,比起医院的恐怖,许多东帝汶男人和妇女更喜欢由修女办的诊所。在东帝汶,人们说,“我们上医院去死”。他们

不能相信或依赖医院。

我确定的第二种类型同间接地受到印度尼西亚非法占领影响的妇女有关。她们包括那些其丈夫、孩子、父母、朋友和亲属遭到杀害、酷刑或失踪的妇女。这一点在一个东帝汶母亲团体最近写给希拉里·克林顿的信中得到强调。由于时间有限,我将简略地谈谈这个问题。仅举一个关于这些间接暴行的例子:印度尼西亚军方绑架东帝汶男孩,把他们带回印度尼西亚当佣人。

正在东帝汶发生的一切直接违反了许多国际公约。这些公约包括:《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印度尼西亚已批准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同特别委员会最有关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鉴于东帝汶人民因印度尼西亚军方的非法存在和种族灭绝行动而遭受的长达约19年之久的外国征服、统治和剥削(这是剥夺基本人权),并且鉴于东帝汶妇女在这一时期和一直到今天所遭受的有系统侵犯人权行为,东帝汶警报网/加拿大要求非殖化特别委员会向东帝汶派遣一个特别视察团,以获取关于这些暴行的第一手资料。这样一次使命应当与葡萄牙政府共同履行,因为葡萄牙是联合国承认的东帝汶管理国。

东帝汶是特别委员会非自治领土议程上的一个最大的领土。只有当印度尼西亚军方撤出,以及该国得到进行自由和公正投票的权利,东帝汶妇女才能开始早该开始的康复进程。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肯·赤谷先生(日本争取正义与和平天主教理事会和自由东帝汶日本联盟)在请愿者议席就座。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请赤谷先生发言。

赤谷先生(日本争取正义与和平天主教理事会和自由东帝汶日本联盟)(以英语发言):我是日本争取正义与和平天主教理事会的顾问和关于东帝汶问题非政府组织国际联盟的联合国候补代表。我将宣读两项声明,一项声明是代表日本争

取正义与和平天主教理事会,另一项声明是代表自由东帝汶日本联盟。

我将首先宣读名古屋前主教和日本争取正义与和平天主教理事会主席阿洛伊修斯·相马的声明。该声明全文如下:

“印度尼西亚违反国际法入侵东帝汶已经有19年了。尽管自3年前发生圣克鲁斯惨案以来东帝汶问题一直引起国际注意,但当人们问印度尼西亚是否正在试图改变其对东帝汶的政策时,答案显然是没有。尽管在表面上,并且暂时地,印度尼西亚可能正在对东帝汶采取一项‘更加开放的’政策,但我们理事会从东帝汶获得的消息是,军方对全体公民和天主教会的压力只是在增加,‘印度尼西亚化’正通过诸如移民之类的措施加快进行,因此,应尽早达成一项符合国际法的解决办法。

“我出席了于今年5月31日和6月4日期间在马尼拉菲律宾大学举行的关于东帝汶问题的亚太会议。我相信,许多成员知道在那次会议上发生的一切。菲律宾政府在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压力下拒绝让许多参加会议的外国人士入境。我也在预定启程时间被拒绝了登上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班机的权利。对我来说幸运的是,菲律宾天主教会的贾米主教替我同菲律宾政府交涉,并使我得以参加会议。我愿借此机会对我在菲律宾的天主教同事们在极为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主持公道表示衷心感谢和钦佩。

“会议在最后一天通过了18项决议,在最重要的一项决议中,会议要求释放泽纳纳·古斯芒和所有政治犯,并要求泽纳纳参加解决东帝汶局势的谈判,主张立即停火,使东帝汶彻底非军事化,以及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公平和真诚的公民投票,支持毛巴拉抵抗运动全国理事会的和平建议和其他东帝汶团体关于真正自决的倡议;要求人权委员会关于酷刑问题的特别报告员就在东帝汶印度尼西亚军方对妇女犯下的暴行和性暴力以及强奸同东帝汶妇女进行协商,谴责印度尼西亚在东帝汶推行的强制性节育和过分的计划生育方案,向东帝汶



妇女表示声援，敦促印度尼西亚政府履行自己的承诺，允许人权和人道主义组织、传播媒体以及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进入东帝汶，表示支持印度尼西亚境内的赞成民主运动，承认东帝汶为主权人民和国家，重申承诺以一切方式帮助毛巴拉人民争取真正解放的斗争。

“在会上，我代表来自亚太地区的与会者为东帝汶发出了共同呼吁。我呼吁印度尼西亚根据在印度尼西亚建国时表达的理想和联合国各项原则尽快以和平方式解决东帝汶问题。我补充说

“当东帝汶人民获得独立时，它们不想与印度尼西亚为敌，而是希望同印度尼西亚建立友好与和平的关系”。

“在对联合国讲话时，我要求本组织更加强有力地开展在作为其理想之一的非殖化进程中的工作，并使印度尼西亚相信，尽管东帝汶是一个亚洲小国，但解放东帝汶对世界和亚洲是重要的。

最后，我恳求委员会原谅我谈到一件个人的事情。目前，我是一位退休的主教，被免除了所有教会的职责。然而，我想说，我打算从现在起尽我一切努力，以便使我在东帝汶的兄弟姐妹们能够获得真正的幸福。我猜想菲律宾的首席主教、辛海梅红衣大主教对会议对东帝汶采取的不民主和不人道的行动感到惋惜，并向东帝汶的贝洛主教表达了这种感情。

在解决东帝汶问题过程中，现在是取消所有形式的政治和宗教花招的时候了。联合国现在应当重新意识到：推动解决该问题是其真正的职能。

最后，我要请求联合国为此目的尽最大的努力。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梶冈英志先生(自由东帝汶日本联合会)在请愿者席位就座。

梶冈英志先生(自由东帝汶日本联合会)(以英语发言)：在本委员会发言是一种荣誉，该委员会监督联合国为之成立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即使殖民统治下的领土实现非殖化。

随着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的到来，本组织深切希望属于本委员会权限内的所有领土都能够尽快行使其自决权利。当

然，在东帝汶问题上，不能实现这一目标将是背叛联合国所依赖的原则以及无情剥夺了东帝汶人民享有正义。

本组织认为，公众舆论可在支持联合国寻求解决东帝汶问题的工作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因此，日本联合会今年5月邀请英国记者马克斯·斯塔尔公开报道其在1993年后半年对东帝汶进行3个月访问后所得到的调查材料。他关于即在圣克鲁斯墓地枪杀哀悼者之后在蒂力发生的“第二次屠杀”的调查材料，有一位证人在今年3月的人权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并在一个于一些国家播放的电视纪录片“一个民族的死亡”中介绍。因此，我今天将在此从这些发现中提出一些我认为与我们极为有关的结论。

同在圣克鲁斯墓地被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的穿制服士兵枪杀的情况成为对比的是，“第二次屠杀”的很多受害者据信在印度尼西亚医生知道的情况下给予一剂效力很强的叫作多聚甲醛的消毒剂片剂之后死在蒂力的军事医院。两名幸存者描述了一些由于吃这种药片所引起的症状，伦敦的一位专家在分析了正是那种蒂力医院所使用的药片之后于稍后证实了这些症状：胸腔燃烧的感觉、头晕、昏睡、失调 and 昏迷。当死亡出现时，则归因于循环方面的损坏。

一名目睹士兵给躺在医院停尸间的受伤者喂药的东帝汶试验室技术员宣称：这些药片在无印度尼西亚医务人员的许可情况下本来是不能发放的。鉴于这种药没有任何良性的医药用途，斯塔尔先生指出：

“显然士兵和喂药的助手们以及从医药库中发放药品的当局这样做不是要帮助受伤者，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知道这些药会致命或帮助他们干掉被送到停尸间的受伤者。”

据目击者指出，在肆意屠杀和虐待受伤者的整个过程中，医院主任温雅塔医生和一名从事6个月全国服务的年青医生正在医院中，在人们视觉之内并监督工作的进行。

如果能够象一些人那样指出：在墓地枪杀哀悼者是一种失常或对挑衅的过度反应，那么显然不能说帮助干掉幸存者的军事医院的医务人员行动是同样的情况。斯塔尔先生用给犹太受害者使用消毒剂的纳粹医生作比较，这些医生把受

害者看成是“害虫”。人们也想起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的日本医生，他们对在活着的中国人、俄国人和朝鲜人的“原木”——这是他们对受害者的称呼——身上进行令人难以启齿的残酷试验毫不感到内疚。

这不是关于东帝汶的印度尼西亚的医务人员合谋杀害东帝汶人的第一份报告，但时间不允许我在此详细阐述。我要指出的是，显然同纳粹和日本医生的情况一样，即受害者根本不同于医生本身的概念从心理上使这些医生能够参与对他们的杀害。然而当印度尼西亚试图为其在东帝汶的存在寻找理由时，它以类似日本帝国为其在朝鲜和满洲国殖民统治辩护所使用的论据的方式指出：东帝汶人是兄弟。现实使这种宣称成为谎言。

应当铭记的另外一点是：在这些事件发生后整整两年半中，没有一个国际机构前往该医院进行调查。从来没有人听到甚至一种关于将使有关医务人员绳之以法的建议。当一些记者今年2月试图就第二次屠杀采访贝洛主教时，他们被阻止与他会面。相反，一名其兄弟是印度尼西亚侵略和占领东帝汶的关键战略家之一的印度尼西亚牧师、马库斯·瓦南迪神父，会见了记者并告诉他们所描述的事件并非属实。

人权委员会在经过难以忍受的漫长过程之后，终于成功地向东帝汶派遣了一名关于草率和任意处决情况的特别报告员。我相信他此刻坐在这里。应赞扬各有关人士促成实现这次访问，然而甚至这一微不足道的步骤竟需要如此长的事实，显示出东帝汶的占领国如何认为自己可在不担心严厉的国际谴责情况下对长期受苦的东帝汶人为所欲为。应当指出，当局通过把政治犯从帝力转移到爪哇岛而为报告员的访问作准备，以确保特别报告员不与他们接触。

印度尼西亚极力劝说世界相信它正在改善东帝汶人民的状况，但上述例子表明：只要东帝汶人被迫生活在外国占领之下，根本改善其命运就不可能有多大希望。

殖民主义是对被殖民统治的人尊严的侮辱，而正象过去19年所十分清楚地表现的那样，它也将殖民者的最恶劣的特性表现出来。许多印度尼西亚人正开始了解东帝汶人在印度尼西亚占领下遭受的侮辱和残暴，并为此感到羞耻和义愤。

有些人不顾其个人安危公开批评这种占领。我认为对大多数印度尼西亚人来讲，东帝汶的解放将结束他们国家历史上这可悲的一叶，对他们也是极大的宽慰。在联合国指导下南非几十年来反对种族隔离制度所进行的不懈斗争取得了胜利，赢来了对黑人和白人同样具有希望的时代。如果联合国有志这样做的话，它没有理由不能在东帝汶取得类似的成功。

请愿人退席。

应主席邀请，英格拉·马滕松夫人（东帝汶问题议员团）在请愿人席位就座。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请英格拉·马滕松夫人发言。

马滕松夫人（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谢谢你为东帝汶问题议员团提供这次机会，以表达其对东帝汶继续受到非法占领的关注。我叫英格拉·马滕松，是瑞典议会议员和议会人权小组的一名积极成员。我还是瑞典联合国委员会理事会的成员，协会的优先项目之一就是东帝汶问题。

能够在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发言是一件荣幸的事，该委员会主动承担了在本十年末消除种族主义的崇高任务。东帝汶问题议员团是一个国际组织，由20多个国家的两百多名议会成员组成。

我今天高兴地代表该组织来到这里。该组织特别要我今天来到这里，因为我是去年9月对东帝汶和印度尼西亚进行访问的瑞典议会代表团的成员。我们的访问是自从圣克鲁斯屠杀以来议员们进行的首次访问，当时印度尼西亚政府军向和平示威开枪，造成大约275名东帝汶人被杀害。根据我访问东帝汶获得的第一手经验，我愿提请各位成员对我本人和各位议员对东帝汶所持的一项关注给予重视。

应当指出，在我们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印尼政府并未提出批评。批评是在我们公开讲述了我们的经历之后发生的。我愿强调指出，我们的访问是以瑞典议会单独成员和观察员的身份，并非受到瑞典政府和议会的正式派遣。印度尼西亚政府确实同意尊重人权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上它并不接受国际上对侵犯人权提出的批评。只要印度尼西亚仍然

拒绝核可和批准有关人权的公约，确有必要加强对印度尼西亚政权的观察和批评。

在印度尼西亚，特别是在东帝汶，压制是严重的。东帝汶人民几乎生活在一座监狱中，受到军方和警察的监视。东帝汶大约有1万名印度尼西亚士兵，约3000名警察。一些消息来源称，那里有14个营，士兵人数高达14 000至15 000人。副军事指挥官声称，部队主要从事于为当地人口修建道路、村庄和房屋，这样做的目的是将帝汶人转移到农村地区。

我们的建议是，让平民专业人员建造道路和房屋会更加经济与合理。当然，这对当局来讲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真实的情况是，军方和警察部队均为针对该国帝汶居民的巨大的压制机器的一部分。新建的公路在与游击队的战斗中发挥了一种重要的军事功能。军队大约已经修建了5000个房屋。全国各地已经修建了约40座新的村庄。我们访问东帝汶的第一天参观了其中之一，它离帝力只有一小时多的车路。这使我想起了我曾在伊拉克北部看到的所谓战略或称集体村庄。毫无疑问，也许是所有居民都愿意回到他们自己的村庄。

与帝力街上的人交谈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始终被安全警察或军事人员跟随。但我们却有机会会见了帝力天主教会的负责人贝洛主教。他在过去十年中一直是主教，能够被认为是那里人民的代表。他是一个在非常压制的社会里十分勇敢的人。贝洛主教告诉我们，对那些不承认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具有权威的人的虐待已加深。他还告诉我们，他从一些犯人和从前的犯人那里收到信件和信息，讲述各种不同形式的酷刑。贝洛主教指出，人权局势根本没有变化。他说，印度尼西亚部队的全面撤出是极为必要的。

这位主教认为，与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的会晤是重要的，但东帝汶人民应在会谈中得到代表，因为他们是最为关注此问题的一方。这些代表不应由印度尼西亚人，而应由东帝汶人民选出。贝洛主教还就我们能够参加谈判的东帝汶人提出建议。如果教会同意的话，他本人也愿意参加。

另一个引起巨大关注的问题是对泽纳纳·古斯芒的监禁。他是东帝汶抵抗运动的象征。他拒绝印度尼西亚宣称的

已经将东帝汶与印度尼西亚合为一体的说法。他否认他曾经或仍然是印度尼西亚公民。古斯芒现在正在服20年监狱徒刑。我与我的同事一道申请获准与古斯芒见面。不幸的是，这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必竟在古斯芒受审的帝力法庭与两位法官进行了一次交谈。

我想补充的是，我们代表团的议会成员之一是一位对人权有特殊兴趣的经验丰富的律师。在与这些法官和其他有关当局见面之后，并经过研究某些书面文件，我们得出了如下结论：

在裁决作出之前，雅加达和帝力的其他当局似乎已经作出了结论和判决。所使用的审判方法并非依据被告所具有的权利，并且不符合公正和正确审判的国际准则，审判本身也不符合印度尼西亚的刑事审判法。对古斯芒权利的侵犯在他被捕之后便立即开始了。在警察和军方审问期间没有律师在场。印度尼西亚当局声称的古斯芒不愿意任何律师在场似乎并未反映他的自由意愿。

在考虑到此案的结果时，这种说法似乎没有说服力。后来曾向此案委派了一名辩护律师，但众所周知，他与印度尼西亚军方要人有密切联系，并且他的行为似乎并未体现古斯芒的最佳利益。与我们交谈的两位法官对古斯芒是否得到一个经他本人自由选择的律师作不出明确的答复。

审判是公开的，但是国际观察员没有被给予机会阅读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文件。我们要求容许我们看看法庭的档案—非机密部分—但是这个要求被拒绝了，据解释全部档案已经送到雅加达。档案的副本没有留在法庭，这是异乎寻常的。

法庭不准古斯芒为自己辩护，这不但违反印度尼西亚法律，而且同国际准则和公约矛盾。出席审判的许多证人本人是囚犯—或在他们判决之后，或在他们本人被审判之前。这些证人的说法是否自愿似乎有疑问。证人们知道他们在审判上所说的话可能在后来他本人审判时被用来对付他们，这对他们有很大影响。然而，所谓反颠覆法没有用来对付古斯芒，这是积极的。但是，另一方面，可以强烈反对—也的确有人反对—应用印度尼西亚法律和谈判程序。这不符合国际

准则，因为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的权利没有在国际上被联合国承认。

由于这些缺陷，东帝汶国会评论员感觉到对古斯茅的判决不能接受。因此，他应立即释放并保证给他一个由他自由选择的一处庇护所。

支持东帝汶的国会议员今年2月3日会见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秘书长。我有幸参加那次会见。我谨在这里重申我们组织提出的适用于特别委员会审议的某些问题。

自从葡萄牙国会评论员访问该领土的安排在1991年11月失败和同年的圣克鲁斯屠杀以来，葡萄牙和印度尼西亚的外交部长在特别委员会主持下举行了四次会晤。在处理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历次决议中所涉及的原则问题上没有什么进展。

印度尼西亚政府坚持其立场——就在今天早上已在这里说过——兼并该领土因1976年5月31日区域民众议会投票而有效，而且这一进程符合大会1960年第1541(XV)号决议的要求。它声称在首都帝力该议会成员按1人1票的原则挑选，而在其他地方他们则

“按照传统和东帝汶人民的特征”

而被任命。没有证据表明在帝力举行过任何选举。根据当时在那里的许多帝汶人说，人民议会的所有37名议员都由占领军挑选。在帝力不存在自由和公平选举的条件，因为许多有资格投票的人都逃到乡村去了，城市处于军事占领下。

支持东帝汶国会评论员满意地指出，在1994年1月，秘书长指示由政治事务司长弗朗切斯克·本德雷利率领的一组秘书处官员访问里斯本、雅加达、东帝汶和澳大利亚，拟订一项倡议以便为解决自决这一核心问题铺平道路。我们欢迎这一事实：在里斯本、雅加达、东帝汶和澳大利亚、该团同东帝汶团体举行会见以听取他们的观点，尤其是，我们高兴地知道代表团同被监禁的东帝汶抵抗力量领导人桑纳纳·古斯茅举行私下磋商。这一使命第一次表明联合国采取行动按照第37/30号决议的要求听取东帝汶人的意见。

东帝汶人民近20年来饱受战争和外国占领之苦。现在已是时候采取具体行动迅速结束他们的苦难，其办法应是能为解决自决这一核心问题奠定基础。支持东帝汶国会议员感到

已是时候应采取具体作法为评估人民关于他们未来看法的正式行动铺平道路。为此，我们建议以下：

第一，秘书长应正式向所有有关各方建议从该领土撤走印度尼西亚军队并在严格国际监督下根据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历次决议举行公民投票。他还应建议在该领土设立临时政府以确保正确进行选民登记以及在公民投票之前的时期中遵守言论和集会自由。

第二，在采取行动处理自决这一核心问题前，建议联合国在秘书长办公室直接监督下在东帝汶建立永久性存在，其目的如下：监督领土非军事化并撤走一切重型武器和军事装备；使联合国各专门机构能够处理人民的人道主义需要；同东帝汶教会和印度尼西亚独立的人权非政府组织，诸如法律援助基金会合作监察人权局势；恢复东帝汶人民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

人们认识到印度尼西亚政府不会立即欢迎这些想法，但是在入侵后的18年中，没有维护《联合国宪章》原则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原则的决心的任何迹象对进展是个严重障碍。

总之，建议特别委员会同秘书长一起，首先向印度尼西亚当局表明他们遵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1994年主持的协商一致声明是一个重要和必需的建立信任措施，以表示他们有良好的意愿和承认国际社会的愿望；第二，使印度尼西亚当局感到有必要容许让国会议员和新闻工作者以及人权组织，尤其是国际大赦组织和亚洲观察组织自由和不受限制地进入该领土；第三，敦促印度尼西亚当局无条件释放所有东帝汶政治犯，不管是否已受审判；最后，同样重要的一点，要求废除对抵抗力量领导人桑纳纳·古斯茅的明显的不公平审判，并使他获释以使他在磋商中能起他应有的作用，使东帝汶问题达成解决。

然而，尊重人权是不够的。必须容许人民选择自己的未来。

东帝汶是在本委员会议程上余留的最大领土。这一问题仍在那里的唯一理由是印度尼西亚独裁政府的不妥协态度。最终解决将来自印度尼西亚人民，他们之中许多人不愿

意抱住东帝汶不放。如果印度尼西亚人被允许有一个真正民主社会,所有人民都能自由说出自己的想法,我预期东帝汶不久就会自由。

最后,我要求委员会也听取要求得到自己权利的东帝汶人的声音。非殖化特别委员会今天有机会为另一个殖民领土走向自由迈出一步。我希望它将迈出这一步并帮助结束东帝汶人民的苦难。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汤马斯·马赫迪先生(基督教国际和平组织)在请愿者议席就座。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请马赫迪先生发言。

马赫迪先生(基督教国际和平组织)(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基督教国际和平组织感谢你和24国特别委员会其他成员给我们这次机会就东帝汶问题发言。基督教国际和平组织这一国际天主教和平运动赞赏你们为完成委员会的使命同有关各方一道作出的努力。

《世界人权宣言》、大会1960年12月14日有关非殖化的第1514(XV)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第384(1975)和389(1976)号决议是为具体的人权,包括自决权,进行工作的基础。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继续建议调查和防止帝汶人民遭受的虐待,包括建议任命联合国调查酷刑问题的特别报告员。

基督教国际和平组织支持联合国所有这些努力,包括利用秘书长的斡旋实现东帝汶问题的公正、全面和国际上可接受的解决。

人权组织和所有其他有关方面可在这一进程发挥作用。大赦国际1984年2月16日的报告《事实和假象:执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各项建议》提供了宝贵的文献。它包括1994年1月14日帝力的卡洛斯·费力浦·希梅内斯·贝罗主教给一位朋友的一封信。他写到:

“我写本信谨告诉你们东帝汶继续有酷刑存在。1994年1月4日,军方在帝力等待一位名叫萨尔瓦多·萨尔门托的青年,他是教区学院的学生。当他离开教室的时候军人把他抓住,把他塞进一辆军用车辆并把他带到一处地方,他在那里遭到踢、打和酷刑,直到几乎死

去。然后,他们迫使他识字的双亲公开说明他们曾看见自己儿子参加颠覆会议。他们想要用这种非正义行为强制宣布桑乔·阿马拉尔神父是一个反印度尼西亚的牧师。”

基督教国际和平组织于1994年2月18日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五十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报告说,马克斯·斯塔尔先生采访的目击者作证说,1991年11月12日帝力屠杀的幸存者在被带到维拉·胡萨达军方医院之后被杀死。这次屠杀仍待进行充分调查。

基督教和平组织呼吁释放所有东帝汶政治犯,包括萨纳纳·古斯毛。

尽管东帝汶长期解决方法继续得到辩论,各种倡议能够并必须为处理自决问题的机制奠定基础。各项倡议可包括履行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商定的承诺,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工作小组和专门机构的接触机会;国际和人权团体更自由地出入东帝汶;同政府、非政府和政府间组织的对话;裁减军事人员;以及执行所有国际人权文书。联合国主持的对话应当继续下去,但是,任何认真的建议必须包括东帝汶人民参加谈判。

让我们一道努力,在公开和勇敢的对话中建立各种机制,尊重东帝汶人民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并保护他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利,包括自决权。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马赫迪先生的简短发言,这使其他请愿者能够发言。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查尔斯·谢纳尔先生(东帝汶行动网/美国)在请愿者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谢纳尔先生发言。

谢纳尔先生(东帝汶行动网/美国)(以英语发言):我的名字叫查尔斯·谢纳尔,我是美国东帝汶行动网的协调员。我也是东帝汶国际联盟驻联合国代表,这是一个隶属新闻部的非政府组织。

今天,我代表东帝汶行动网向委员会发言。我们赞赏委员会今天抽出时间在这里听取我们和其他非政府和个人的

发言。在过去一年中,联合国几个机构越发对非政府组织有关东帝汶局势观点感兴趣,特别是听取东帝汶人民本身的发言。这是积极的事态发展,我们希望,这种会议中所得到的观点和信息将有助于联合国成功和迅速地结束非殖化进程。

东帝汶行动网是在帝力外面的圣十字墓地发生大屠杀之后在两年多以前成立的。但是,印度尼西亚军方的屠杀和对东帝汶的占领已经持续了将近20年。我们强烈敦促委员会帮助推动印度尼西亚政府进行认真的谈判——不要只是为了做给人看的对话。毛贝雷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提出的三阶段和平计划是推动讨论的出色的基础。我们敦促让他们和其他东帝汶人民的真正代表参加印度尼西亚同葡萄牙之间的谈判。

我们认识到,说服雅加达是不容易的。最近对三家印度尼西亚主要新闻周刊的禁止,加上对劳工活动分子的镇压和对东帝汶人的进一步的逮捕和恐怖都表明雅加达政府正在感到国际和国内压力。不幸的是,它的反应是杀掉送信人,设法压制讨论和掩盖丑陋的现实。但是,化妆品治不了癌症。

上个月,我有幸出席在马尼拉举行的亚洲-太平洋东帝汶会议。尽管印度尼西亚迫使菲律宾政府排除几位东帝汶领导人和世界著名的和平与人权倡导者出席,50多位外国人士同200多位菲律宾人士举行了5天的会议,讨论如何为东帝汶人民实现自决和其他人权。

尽管雅加达和马尼拉的前将军们为了阻止这次会议作出了拙劣的努力,我们举行了一次非常富有成效的会议。那次本来可以象今天我们在这里的会议那样成为对东帝汶进行的又一次平静的讨论,但由于两个政府如此违反公认的文明行为准则的粗暴行动,会议成了一次世界级的新闻事件。旁观者不禁要问:“他们试图掩盖什么?”

本委员会知道他们设法掩盖什么。委员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已经听取了东帝汶和其他人19年的证词和请愿,证明印度尼西亚种族灭绝和占领的极大的不人道行为。特别报告员和秘书长的特使曾到东帝汶去并对其调查结果提出报告,其中一位本周刚到那里去。尽管今天的听证将提供一些新资料,我们希望它将起更大的作用。

行动是东帝汶行动网中心,我们促请联合国也有所行动,

因为只有联合国才有用来衡量政治权利和人权的普遍公认的标准,这些正是印度尼西亚在法律上同意维护的标准。现在是实施这些标准的时候了。东帝汶不应该在印度尼西亚的军事统治下进入第三个十年。

在过去一年中,东帝汶行动网成员已经超过1 500,我们在美国各地有15个地方小组。我们正在努力教育美国人改变美国的政策,改变美国政府在武装和支持印度尼西亚自1975年以来的占领方面所采取的不光彩的作用。

说美国政策已经转变,那是过于乐观,事实上,美国政策正在变动中。行政当局和国会中有人捍卫现状,不愿意讲任何可能使印度尼西亚不舒服的话。他们恐怕影响美国公司从在印度尼西亚的贸易、矿产和武器销售中获得的利润。

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不这样认为。他们知道,违反人权和继续剥夺自决的情况如此严重,继续照常行事是不人道的。我仅举几个去年会议以来所发生的事件来说明这一点。

自从1992年以来,国会已禁止美国对印度尼西亚的一切军事援助,这种援助的形式是印度尼西亚士兵来美国接受训练。虽然国务院企图避开这一禁令,让印度尼西亚支付训练费,但众议院已在今年5月通过立法,堵塞这一漏洞,这项立法现在正有待美国参议院决定。

今年7月,美国国务院响应公众和国会有关东帝汶的压力,拒绝让4架美国制造的F-5E战斗机从约旦转售给印度尼西亚。而且,今年7月,克林顿总统和苏哈托总统在东京会晤时,他们讨论了东帝汶问题,还讨论了印度尼西亚境内的人权问题。

去年秋季,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一致批准范戈尔德参议员的修正案,这项修正案将把对印度尼西亚的武器出售同东帝汶的人权的问题挂钩。虽然包括这项修正案的法案从来没有进入参议院全体会议讨论,但这是国会第一次对某一国家把军售同人权挂钩。

冬季期间,克林顿政府进行了一项广泛的机构间政策审查,已决定不批准美国对印度尼西亚出口轻型武器的出口许可证。华盛顿认为,这些正是最近被用来在东帝汶屠杀人民

的武器。

就在两个星期以前,参议院拨款委员会通过立法,这项立法将禁止印度尼西亚政府在东帝汶使用从美国政府方面采购的一切致命武器。虽然这一立法在参议院上被击败,但它象征着国会公开对抗印度尼西亚的意愿有所增加。本周或下周,参议院中将有进一步的行动。

国会各委员会批准的其他立法,将质疑美国对那些军方大量参政和虚报军事开支的国家提供多边贷款和非法人道主义援助的支持。印度尼西亚已被列为这些问题的主要代表。

印度尼西亚政府高度优先重视美国政府宽容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压迫性作法。今年4月亚洲协会主办了一次美国和印度尼西亚关系的会议,这次会议由各主要的矿产和银行利益集团赞助,出席会议的有外交部长阿里·阿拉塔斯,30多名印度尼西亚的来访者,以及印度尼西亚驻美国的全部外交人员。这是一场改变美国人民对印度尼西亚的看法的一场持续的运动的开始。

参加这次会议的绝大多数人似乎认为,问题在于形象,而不是实质。看来,他们中间几乎没有人能够理解,杀人或剥夺他们的基本的政治权利和人权是错误的,即使这样做并不影响利润。

在结束前,我愿引用一位长期为政府服务和长期参与东帝汶问题的美国政治领导人。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现在是一位来自纽约的参议员,但在1975年至1976年期间,他曾经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他在他写的一本书中吹嘘到,在印度尼西亚入侵东帝汶之后,

“美国希望情况就能如此,并且为达到这一目的而进行了努力。国务院想要联合国采取的任何措施毫无效力。这项任务给了我,而我也执行的相当成功”。

后来,莫伊尼汉参议员的想法已有改变。今年3月,他给他的选民写到:

“我同你们一样关切这种长期践踏《联合国宪章》的情况,以及印度尼西亚军队继续犯下的践踏人权状况。甚至印度尼西亚都承认,东帝汶人民有自决的权利,但它却拒绝让他们行使这一权利。而且屠杀在继

续,1991年印度尼西亚部队在帝力附近的圣克鲁斯坟地屠杀一次和平游行那样。”

“……美国早就应该对印度尼西亚政府采取一种更加强硬的做法”。

我希望我国政府听取前大使莫伊尼汉的这些话,并且1975年以来参与这一问题的其他人,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境内的那些人,能够以莫伊尼汉为榜样。

东帝汶局势--我们就是这样轻描淡写地形容20年的入侵、占领、种族灭绝、谋杀、强奸、酷刑和恐怖--要得到解决,政治家和外交家就必须放弃他们的僵化立场,不再把不可剥夺的人权和国际法看作只是一个能够说说了事的问题。

莫伊尼汉大使已经这样做了。我们希望阿拉塔斯外长和苏哈托总统也能这样做。在推动改变雅加达立场方面,本委员会和整个联合国肩负重要的责任,以便使东帝汶人民能够最终和平地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何塞·玛丽娅·阿尔武凯克先生(支持帝汶行动组织)在请愿者席位就座。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请阿尔武凯克先生发言。

阿尔武凯克先生(支持帝汶行动组织)(以法语发言):我的名字叫何塞·玛丽娅·阿尔武凯克,我在这里代表支持帝汶行动组织。支持帝汶行动组织是一个法国组织,它成立于1990年,目的是要捍卫帝汶人民的自决权。我们曾在1991年和1993年,向本委员会提出请愿。

传统上,法国国内了解东帝汶问题的人并不多。因此,我们最初的重点是在法国唤醒公众舆论、新闻媒介、非政府组织和知名人士,应使他们定期了解事态发展情况。

开始时,我们的活动主要在法国的葡萄牙人社区中引起共鸣,法国的葡萄牙人社区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外葡萄牙人社区。然而,其他组织也在更多地重视这一问题。今年我可以告诉委员会一项使法国12个法国非政府组织联手的倡议:支持东帝汶4个月的运动。

1994年3月发起的这场运动目的是在上星期于巴黎举行

的印度尼西亚问题协商小组会议之前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东帝汶问题。除了我们协会外,参加的组织有人民声援组织——它是一个声援南方各国人民的组织——自由法国、达尼埃尔·密特朗基金会、国际人权协会、国际声援组织CIMADE、正义与和平组织、第三世界新闻网、汇集35个发展和声援方面非政府组织的联合会 CRID、法国葡萄牙人团体协调组织、全国中学教育委员会、统一工会联盟和劳工总同盟。

请允许我详细谈谈这场运动的构想。总方向已确定,但每个组织可以根据自己的敏感度和物质能力决定自己的行动方式。至少,每个组织都在联络报上登载了一篇关于东帝汶问题的文章,一些组织还号召他们的成员继续采取行动,以提高公众的认识,或为印度尼西亚东帝汶学生筹集资金,还有一些组织向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提出质问,或通过记者招待会进行干预。

这场运动本身还开展了新闻宣传工作,其方式是向所要文件的任何人提供文件,出版这场运动的通报,发给公众舆论的活跃分子,例如非政府组织、工会、激进人士、一些新闻记者以及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两个机构的法国-印度尼西亚和法国/东南亚友好关系小组的成员。目前正在法国各地循环进行关于东帝汶问题的图文并茂的展览。最后,这个运动还与INFID会议、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和法国外交部等交涉。

尽管这些新闻界对这场运动报导的不多,但它在其他组织和实地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这些组织包括记者无国界组织、全国教育联合会、帮助和支持西藏人民的8个团体、部落行动组织和国际天主教农村协会。一些激进团体和新闻界成员也提到了这场运动,这导致一些人提出了在当地采取行动的许多要求。我们还在20多个法国城市开展了新闻宣传活动,例如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阿让特伊、卡昂、格勒诺布尔、勒芒、里尔、里昂、楠泰尔和巴黎。

除了提高“文明社会”的意识,这场运动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是能够开始提高法国议员的认识。自1986年以来,第一次有代表政府多数派的一个参议员就“印度尼西亚在东帝汶被占领土进行的残暴镇压”以书面形式向外长提问,他问:“法国正在采取什么步骤确保在该领土个人得到保护,国际

法得到遵守”。其他议员也写信给运动,告知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考虑。至今一直有些无动于衷的全国议会也被触动了,这对今后是一个很好的预兆。

最后,要使我们的概括做到全面,我们还必须谈到一些团体。它们虽然没有参加这个运动,但同时也在为东帝汶采取行动。这些组织包括大赦国际和消除酷刑基督教行动组织。

法国境内声援东帝汶人民行动的这一质和量上的飞跃并不是孤立出现。无可争辩,迄今三年来,在全球范围对这个问题有新的认识和行动,这经常是在激进团体,有时在新闻媒介中,但到目前为止很少出现在政府中。仅仅在几年前这还是空想,这一变化使我们产生希望,认为东帝汶人民在不远的将来最终将能够行使自决权。但这种进展感受不应使我们看不到国际上目前存在的各种障碍以及占领国缺乏诚意和该领土的人权状况没有任何改进这一事实。

我们不想谈最后两点,因为我们知道请愿者会向委员会讲述这方面的情况。关于第一点,我们必须在这个讲坛对法国政府行动迟缓和不讲信用表示痛惜。诚然,正如法国历届政府声明的那样,法国不承认印度尼西亚兼并东帝汶。同样法国外交不在假装不知道在那发生的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并承认局势的严重性。最后,以前某届政府的一位资历较浅的外长和共和国总统已向印度尼西亚当局表示了他们的关注,法国勉强投票赞成1993年人权委员会关于东帝汶问题的决议。

但是我国并没有给印度尼西亚施加压力,以制止它侵犯人权的行爲,更不用说确保它遵守国际法。更糟的是,法国外交部明确认为将经济援助与尊重人权挂钩不是上策,尽管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外长理事会在1991年11月的一项声明中要求这样做。

拒绝采取任何具体行动自然是由于我国的经济利益。根据法国外交渠道的消息,1992年法国发展援助的98%是通过阿尔萨斯原子、电信及电子器材制造公司、阿尔斯通电子公司和杜马公司对该国的变相投资的补贴而进行的。但是法国也是向印度尼西亚提供武器和军事部件的主要国家



之一,特别是美洲巴尔直升飞机,这种飞机是在那里许可生产的。最近,原子能工业集团向印度尼西亚出售了20枚105 LG 型火炮,价值总额达1 700万美元。法国在印度尼西亚电信领域也很活跃,其中一部分是提供给印度尼西亚军方。

印度尼西亚没有任何公开的真正或潜在的敌人。因此,向该国出售的武器只能用于镇压、反暴动或进攻行动,例如在东帝汶。由于英国记者约翰·皮尔奇的详细调查,我们知道,联合王国在提供发展援助的同时还提供武器,即隼式飞机。了解这一点之后,谁能保证法国不是这样?

最后,我不能不重复去年向本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委员会应尽可能向公众提供关于其为东帝汶人民自决权采取的行动信息,委员会应根据一个人不能既做法官又做当事方的法律原则,将印度尼西亚排除在关于东帝汶的任何决策过程之外;委员会建议秘书长尽其所能使作为东帝汶抵抗运动象征的桑那那·古斯毛获,同时也不因此忽略进行干预,使其他东帝汶政治犯获释;最后,委员会建议秘书长公布阿莫斯·瓦科先生的两份报告。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理查德·科克先生(英国声援东帝汶同盟)在请愿者议席就座。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请科克先生发言。

科克先生(以英语发言):自1991年圣克鲁斯大屠杀事件发生以来,东帝汶问题重新牢固地确立在国际议程上,这反映在新的外交主动行动中。然而,令人痛心的是,7月8日、上星期五在巴黎,组成关于印度尼西亚问题协商小组的捐助国再次决定在下一年将对印度尼西亚的援助增加到创记录的52亿美元。这无疑是表明西方国家双重标准的最明确证据,它们一方面表示希望印度尼西亚的人权记录将改善,另一方面却不采取任何可能实际上迫使雅加达改弦更张的行动。

英国政府的记录尤其可耻。在约翰·皮尔格的记录片“一个国家的死亡:帝汶阴谋”放映后,报纸的报道和公众对帝汶的关心俱增。然而,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对公众舆论仍然无动于衷,并继续对下院议员和公众提出的问题作出相同的老一套答复。相反,它喜欢宣传印度尼西亚的谎言,例如

“东帝汶最著名牧师之一”驳斥关于1992年11月12日在维拉-胡塞达军事医院发生的第二次大屠杀事件。这位牧师是马库斯·万南蒂,一个派去“协助”贝罗主教的印度尼西亚人。万南蒂的一个兄弟是苏哈托总统的女儿在东帝汶的“旅游开发”中的生意伙伴,他的另一个兄弟叫朱苏夫·万南蒂,是一名 BAKIN 特工人员,他在“Operasi Komodo”(即合并东帝汶计划)中的作用是在美国和西欧极力争取外交支持。贝罗主教从那时起声明,第二起大屠杀事件确实发生。

尽管外交和联邦事务部一向对“他们的关心表示感谢”,但英国公众显然“犯了一个错误,把过去的历史同今天的现实混同起来”并且“不正确地说,东帝汶仍然存在广泛的侵犯人权现象”。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正在鼓励印度尼西亚履行其人权义务”。有许多证据表明,事实恰恰相反。今年6月,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官员制造这样一种印象,即政府正在竭力要求让国际红十字会会见政治犯。英国驻雅加达大使馆发来的一份“内部传阅”电报说的却是另外一回事:外部压力将无济于事。一份内部备忘录把答复就这一议题提出的各种问题的信件描述为“设置障碍”。

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的主要精力花在为“其向印度尼西亚出售武器的明确政策”,特别是关于经过几个月否认后最后在6月份得到证实的出售价值5亿英镑的鹰式喷气战斗机的政策进行辩护。这项政策的依据是《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的自卫权利:这是一项我们为自己要求的权利,剥夺其他人的这项权利将是前后矛盾的、歧视性的”。实际上,英国政府否认波斯尼亚享有这项权利。印度尼西亚没有受到来自任何其邻国的可想象的威胁。该地区的扩张主义国家是印度尼西亚。早在1960年代,雅加达的对抗政策对马来西亚的主权构成十分真实的威胁,1963年,印度尼西亚占领西巴布亚,当然于1975年入侵东帝汶。向印度尼西亚提供武器是不顾道德和法律的考虑给地区军备竞赛火上加油。外交和联邦事务部“自己的明确政策”还破坏了一些主动行动,例如美国政府去年8月为阻止出售约旦的F-5E喷气战斗机所采取的主动行动。印度尼西亚将军只是说,他们将向英

国或法国购买,已经排除向俄罗斯购买。

此外,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有许多为出售辩护的第二种理由。它说,它得到保证,鹰式战斗机将不会用来对付平民。1984年,它说:“它通常不寻求保证,因为这些保证不能对这些设备今后可能的使用提供任何可靠的保障”。影子政府外交事务发言人于1993年10月28日致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阐明了这些保证是什么。他至今没有收到答复。

外交和联邦事务部说:“政府将不准许出口任何可能用于进行国内镇压的防御设备”。其他部门却承认,设备的场地是购买国自己的事,一旦设备到达目的地后对其进行监督是不现实的。外交和联邦事务部说,印度尼西亚所拥有和正在购买的鹰式战斗机是训练机。这同空军参谋长苏克拉蒂元帅于1985年1月所作的宣布是相互矛盾的,他当时说,于1980年代早期运来的鹰式战斗机正在新的空军部队中服役,“其用途是高级训练和战术性作战”。同样,研究与技术部长哈比贝博士于1994年4月17日说,新的鹰式战斗机“将不仅用来训练飞行员,而且还将来进行地面攻击”。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声称鹰式训练机不可能转用为可进行全面地面攻击的战斗机的说法同英国航空航天宣传品完全自相矛盾。

这就是所谓的“设置障碍”。英国东帝汶同盟所关心的并不是对一样东西的特别使用,而是我国政府给予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的“批准的象征”。尽管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在对东帝汶人民的种族灭绝中起了作用,但英国政府实际上说,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是负责任的、可信赖的。东帝汶人就在1980年代中期使用鹰式战斗机对该岛屿东部进行轰炸所作的目击者证词被作为“证据不足”而断然拒绝考虑。印度尼西亚的宣传却以其表面价值得到接受。

“我认为,那些提出此类指控的人应该做得更好一些。

我们已经说过,我们愿意审查关于鹰式战斗机正在东帝汶被用作镇压性目的确实凿证据,但是没有任何人提出任何这样的证据。”

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副部长阿利斯特·古德兰这样说。然而,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将不明确保证,鹰式战斗机没有在东帝汶使用。

古德兰先生还声称,印度尼西亚正在把其军队水平降低到一个小省的平均兵力,印度尼西亚似乎每年都这样说,然而,这一点并没有得到去年11月访问东帝汶的一位英国军事武官的报告的证实,他的“确凿证据”揭露了同公众知道的截然相反东帝汶一面。该报告的标题是:“机密…不得,再说一遍,不得登报。”

他问帝力地方指挥官卢米登上校印度尼西亚在东帝汶的兵力。这位指挥官最后承认有10个营,每9个月轮换一次。他没有提供撤军时间表,但希望“在1995年完全控制情况”,只留下“本地营”。关于他同东帝汶副总督的会晤,这位军事武官说:

“永久的印象是:该省小官僚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制造数据上,而不是管理该省”。

这位英国军事武官同来自其他大使馆的官员一起坚持要求参观圣克鲁斯墓地:

“(我们)很想判断前两年在那里发生了枪杀事件是否因为该地没有本来可驱散示威者的出口。(我们)看到,至少有四个出口,这个墓地的围墙不高…这一布局本应该允许训练有素的军队在很少流血的情况下驱散示威者。”

英国在东帝汶问题上对印度尼西亚的外交容忍可追溯到入侵前后发生的事件。在1975年7月,英国驻雅加达大使建议,伦敦应保持沉默,并且“避免采取反对该政府的立场”,因为:

“印度尼西亚尽快地、尽可能不引人注目地合并该领土符合英国的利益”。

到1985年,印度尼西亚已成为英联邦以外英国最大的受援国。自1991年以来,外交活动显著增加,进行了无数次部长级访问和贸易代表团访问。向雅加达慷慨地提供了主要以《援助与贸易条款》项目为形式的援助。1994年4月7日,阿利斯特·古德兰宣布了一笔8 000万英镑的“软贷款”,贷款的大部分将用于电讯。提供这项“援助”的公司正是向印度尼西亚军方提供通讯、雷达和电子设备的公司,这不是偶然的。这接着去年经道格拉斯·赫德同意的6 500万英镑

的“软贷款”，这笔贷款用于在东加里曼丹的一个发电厂，英国采矿公司在那里有着巨大的利益。这些协议不仅同英国贸易挂勾，而且还典型地引向自上而下的基础结构开发项目，这些项目使大规模的英国投资项目受益，而不是鼓励当地人民的发展。

这一“条件性”同道格拉斯·赫德在1990年和1991年所主张的条件性相距甚远：

“那些倾向于多元化、对公众负有责任制度、尊重法治、人权和市场原则的国家应得到鼓励。那些坚持推行镇压性政策或管理腐败的政府…不应当指望我们以稀少的援助资源支持他们的愚蠢行为，因为这些资源可更好地用在其他地方。”

至1991年，这一观点已具体化为道格拉斯·赫德建议适用于欧洲共同体预算的三项良好管理原则：第一，尊重人权和法制；第二，奉行健全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第三，政府体制的能力与责任。

甚至在那个时候，各援助机构认为小国和非重要国家将成为例子，而象印度尼西亚这样的较大国家的违反行为将继续被忽略。它们的预测证明是对的。援助的条件自那时起被放弃，正合印度尼西亚的利益，因为它不会通过上述任何原则的考验。

印度尼西亚政府说它要进行对话，但它却监禁了哈纳纳·古斯毛，在他据称请求宽容的问题上撒谎，正试图分裂海外的东帝汶抵抗运动，对那些敢于就东帝汶问题讲真话的印度尼西亚人进行起诉，并在继续违反八项大会决议和两项安全理事会决议而进行种族灭绝式的占领的过程中犯下更多的侵犯人权的行。

最后，英国联合会建议印度尼西亚代表团自问一下：印度尼西亚为什么害怕一个独立的东帝汶。1974年11月10日向印度尼西亚大主教会议发表一项声明—乔治·阿迪琼德罗是起草者之一—的话今天仍然具有强烈的回响：

“如果人们认为葡属帝汶的独立将构成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存在的威胁，那么显然我们的共和国中有什么差错”。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佩德罗·平托·莱特先生(东帝汶问题国际法学家论坛)在请愿者议席就座。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佩德罗·平托·莱特先生发言。

莱特先生(以英语发言)：东帝汶问题国际法学家论坛要向本委员会表达其对东帝汶非常紧迫的局势的关注。印度尼西亚政府18年来一直剥夺东帝汶人的自决权利。现在已很明显，雅加达正在其臭名昭著的战争中失败。正如在很多殖民者政权中一样，雅加达的将军们意识到它们的失败并加紧在被占领领土上的镇压。我们敦促联合国进行积极干预以制止这种镇压。

我曾经指出，尽管在军事力量上存在巨大的差距，然而印度尼西亚政府正在战争中失败。印度尼西亚在做了很多许诺之后，却未从该领土撤走其部队，并保持着一支10 000多人的占领军。另一方面，东帝汶武装抵抗运动却不超过1 000名战士。事实是印度尼西亚军方在18年来一直未能打垮东帝汶的抵抗运动。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失败。

然而，印度尼西亚政权正在很多其他战线上打败仗。雅加达曾计划赢得新一代东帝汶人的心，这些人没有亲眼看到入侵和随后发生的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末的屠杀。这一行动证明是错的。圣克鲁斯屠杀表明：东帝汶青年愿为自由而战。他们拒绝成为印度尼西亚人，其中包括正在雅加达接受教育的极少数人。爪哇殖民者并未吸取胡志明、阿米尔卡·卡夫拉尔和阿戈斯荷·内托的教训。然而年青的东帝汶人却吸取了教训，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将引导其国家走向独立。

印度尼西亚政府意识到其失败，因而加强对年青人和学生的镇压。近几个月来，在东帝汶和印度尼西亚发生了屠杀、监禁和审判的事件。两月前，军方在乌埃罗的地方用机关枪杀害了一个名叫马塞洛的手无寸铁的男孩。他们在折腾了他的尸体之后，把他扔进河里。5月初，有11人因在帝力于外国记者面前示威而被逮捕。其中至少有3人因所谓“策划反对印度尼西亚政府的敌对和仇恨行动”而被判监

禁20个月。

6月两名帝汶年青人因升起独立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旗帜而被判监禁3年。5月份,另外两个名叫安东尼奥·索阿雷斯·阿劳霍和荷塞·安东尼奥·内维斯的东帝汶人,在东爪哇的玛琅被逮捕。荷塞·安东尼奥是毛贝雷学生抵抗运动RENETIL的领导人之一。他几次给东帝汶问题国际法学家论坛秘书处打电话或发送传真,谴责对东帝汶人的拘留和酷刑。我仍然记得他谴责印度尼西亚当局罪行的平静勇敢的声音。他现在同其他人一样,正面临监禁和酷刑。东帝汶问题国际法学家论坛敦促本委员会进行干预,并争取使他得到释放,因为这个案子涉及到侵犯自决权的行为。我们还希望,正在东帝汶访问的联合国关于司法外、草率和任意处决情况的特别报告员,能够调查圣克鲁斯屠杀及随后的那些屠杀,包括上述野蛮杀害马塞洛行为。

印度尼西亚政权正在被打败的另外一个方面,涉及到宗教信仰。东帝汶并未出现宗教战争。然而,将军们造成了一种人为的宗教问题。他们强迫身为泛灵论者的东帝汶人选择5种被官方接受的宗教之一,并正在该领土各地建造清真寺,希望东帝汶人将选择伊斯兰教。雅加达希望,绝大多数人口为穆斯林的情况将会有利于融合。然而,东帝汶人选择了天主教,这成为对占领的另一种形式的抗议。东帝汶大多数天主教神父都是反对侵略者的政治和文化抵抗运动的盟友。卡洛斯·贝洛大主教就是最好的例子之一。他在最近几个月同访问他的外国记者和议员采访中,重申他支持由联合国监督在东帝汶举行一次公民投票。本委员会自然还记得,他在1989年2月的一封信中呼吁德奎利亚尔先生举行一次公民投票。

印度尼西亚军方以加紧镇压东帝汶神职人员而作为答复。很多神父受到威胁和迫害。贝洛大主教也是这种迫害的受害者。他最近告诉一位访问者印度尼西亚军方曾两次试图暗杀他。法新社就在几天前报道:士兵们应在天主教教堂中践踏神圣的圣餐饼而犯下了渎圣罪。这种肆虐的行为暴露了军方在这种极为敏感的失败面前的绝望。

印度尼西亚政权在本国也打败了这场有关东帝汶战争。

多年来,由于东帝汶周围的沉默的帷幕以及对新闻的检查制度,印度尼西亚政府得以使其公民对被占领土上的情况一无所知。在圣克鲁斯屠杀和哈纳纳·古斯马奥的审判之后,情况有所转变。越来越多的印度尼西亚知名人士和组织正在公开质问对东帝汶占领。在这场反殖民主义运动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就是沙拉笛加萨蒂亚·瓦卡纳基督教大学的乔治·阿迪琼德罗先生。考虑到这种事态发展,一些印度尼西亚报纸增加了关于东帝汶的报道。

政府的反应则又是一次新的镇压浪潮。正如委员会所知,最近几个星期印度尼西亚有很多人因表示反对军方的独裁而被逮捕。而象阿迪琼德罗先生那样的其他人,多次受到威胁。政府于1994年6月21日关闭了3种有影响力的杂志—《时代》、《德蒂克》和《编辑》。6天以后,在一次对这种审查制度的非暴力抗议中,又命令拘留数十名平民领袖。

《纽约时报》1994年6月23日报道指出,

“外交官和人权倡导人说,杂志的关闭是几十年来对印度尼西亚新闻自由的最严重的打击”(《纽约时报》,1994年6月23日,A 5页)

IPJET对美国新闻界的迅速反应和许多组织最近提出的强烈抗议表示欢迎;这些组织包括诸如地球之友、国家野生动物联合会、罗伯特·F·肯尼迪人权纪念中心、绿色和平组织、律师人权委员会以及亚洲人权监督等。

最后,印度尼西亚专制当局在外交阵线的战争也在打败仗,特别是在东南亚联盟(东盟)及本地区其他国家当中。一百多个亚洲人权组织在曼谷强烈呼吁东帝汶实现自决。IPJET曾作为共同召集人的在马尼拉召开的关于东帝汶问题的亚洲-太平洋会议在三周时间内被许多菲律宾报纸作了头版报道,尽管雅加达竭力企图制止这种做法。其他请愿人肯定会对马尼拉会议及其结果的重要意义进行阐述。就在两周前,一个由30个非政府组织举办的关于东帝汶问题的特别论坛在吉隆坡批评了东盟国家政府,因为它们容忍象在东帝汶那样的对人权的侵犯。我们对在野的马来西亚人民党主席侯赛因·阿里最近讲的话表示由衷的欢迎:

“一切都是以东盟成员之间的团结的名义作出的,但东

盟不应被用来掩盖侵犯人权和种族灭绝”。

新西兰议会最近采取的要求给予东帝汶自决权的值得称赞的姿态意味着印度尼西亚外交的又一次失败。

在IPJET 1991年的请愿当中,我对纳米比亚和撒拉威人民在其争取自决的斗争中取得的成功表示欢迎。去年我目睹了厄立特里亚的独立。这些案例确认了东帝汶问题根据法治在未来获得解决的可能性。我十分高兴地能够将南非的名字列入这个名单。种族隔离制度也意味着对南非人民的自决权利的公开侵犯。几十年来,殖民主义者力量反复指出南非的局势是不可逆转的,同纳米比亚、西撒哈拉和厄立特里亚一样。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反对种族隔离团结运动更了解情况。纳尔逊·曼德拉前不久还是一个政治犯,而现在他是新南非的总统。

IPJET曾对联合国秘书长发出呼吁,促请他介入并利用他的影响以获得哈纳纳·古斯毛和所有其他被拘留的东帝汶人的立即和无条件的释放。我们已经征得了1 873个签名,这主要来自各大陆的大约40个国家的法律专业人员、政府官员和知名人士。他们当中有50名国会议员、2位前外交部长、外交官、最高法院法官、主教、大学和法学院负责人以及30多个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主席先生,我再次向你提交这次呼吁的成果。同纳尔逊·曼德拉一样,哈纳纳·古斯毛必须在解决东帝汶问题当中发挥主要作用。

正如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1975年7月31日第1978(LIX)号决议第2段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印度尼西亚入侵东帝汶之前的几个月,

“大会、安全理事会及其他联合国机构对殖民地人民实现自由和独立的斗争的合法性给予承认必将导致联合国组织系统向各殖民领土人民及其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一切必要的道义和物质援助”。

东帝汶问题现已到决定性关头,我相信本委员会将促进联合国向被迫害的东帝汶人民提供更大的援助。

请愿人退席。

应主席邀请,东帝汶亚洲-太平洋会议的莱拉·基洛普小姐在请愿者议席就坐。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请基洛普小姐发言。

基洛普小姐(东帝汶亚洲-太平洋会议,菲律宾声援东帝汶和印度尼西亚问题组织)(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委员会允许东帝汶亚洲-太平洋会议(东帝汶亚太会议)转达愿意看到自由在东帝汶诞生的亚洲-太平洋各国人民代表的集体呼声,这个会议由根据国际对话倡导为基础的秘书处所代表。

东帝汶亚太会议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公民自由一致论者、非政府组织和人民组织中一个新的努力。它寻求联络亚洲-太平洋地区人民同东帝汶的战斗中的人民日益增长的伙伴情谊。

该联盟暂时设在国际对话倡导的办事处,国际对话是一个独立的致力于南-南团结的菲律宾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对话倡导在举办最近召开的关于东帝汶的亚洲-太平洋会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促使东帝汶亚太联盟的诞生是我们各自政府在东帝汶问题方面所持的漠不关心-不,是不道德-的姿态的表现。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政治领导人对苏哈托军事政权对东帝汶的公然非法的兼并保持沉默,尽管联合国通过了各项有关决议。这种口是心非为印度尼西亚在该地区炫耀其武力并欺侮邻国壮了胆。

这在苏哈托最近在关于东帝汶的亚洲-太平洋会议一事上为菲律宾政府制造障碍上清楚地表现出来。印度尼西亚威胁从菲律宾撤出几十亿所谓潜在投资。菲律宾总统菲德尔·拉莫斯将军为取悦于雅加达随即禁止所有外国代表团入境。政府甚至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迈利德·马吉尔驱逐出境并且将法国第一夫人达尼埃尔·密特朗列入被禁止的人名单当中。拉莫斯政府退让到如此地步,以致不负责任地使用花招,让法院发出一项禁止该会议在菲律宾任何地方召开的法令。

但菲律宾人民和该地区其他人民的权利是不能被剥夺的。我们不顾政府禁令并由于这个法院允许会议继续进行取得了胜利。

印度尼西亚对菲律宾的欺压和后者的屈服在外交界引起轩然大波,这在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各国之间是从未有

过的。国际新闻媒介对这场争执作了广泛报道。印度尼西亚对菲律宾施加的压力非但未能对其非法占领东帝汶有所遮掩,反而有助于暴露了它努力使其永久化的谎言,特别是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各国人民之间。

东帝汶即使在东南亚国家当中也是比较模糊和孤立的。在关于东帝汶问题的马尼拉会议期间,印度尼西亚军事当局入侵的野蛮和无情以及随后对这一领土的占领在其亚洲邻国面前暴露无遗。

在会议上所提出的事实是清楚和不容置疑的。毫无疑问,这些事实也未能逃过委员会的注意。毫无疑问,在委员会就东帝汶问题进行的看来是无数次讨论当中也多次提到这些事实。因此,我们不愿意以由于印度尼西亚所称的“共同兄弟之情”而被杀害的东帝汶人的数字使其变得麻目。我们也不需要提醒委员会,成千上万名东帝汶人仍然继续在苏哈托军事压迫和剥削的枷锁下生存。

但是,会议披露的情况使亚洲-太平洋地区各国人民感到骇然。对于东南亚各人民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们来说,很难理解苏哈托及其军方怎么能杀害20万东帝汶人而还能对它的邻国隐瞒这一卑劣的行为。同样令人厌恶的是,该地区各国政府居然接受印度尼西亚政府贩卖的谎言。但是,最令人吃惊的是联合国显然未能对所谓不结盟运动的领导印度尼西亚给予纪律处分。

联合国迅速采取行动对付萨达姆·侯赛因,并且在安哥拉、纳米比亚和柬埔寨的和平行动中卓有成效,更不用说在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的建立和平努力了。因此,亚太东帝汶问题会议对联合国在其解决东帝汶冲突的任务面前按兵不动感到费解。更加令人不解的是,大会已经将东帝汶作为一个非自治领土的地位方面的具体任务委托给秘书长。

即使如此,虽然我们对联合国在东帝汶问题上显然拖拖拉拉和一事无成表示质疑,但是,我们也承认它能在其他战线上强制执行大会的协商一致意见,特别是在非自治领土问题上,而且,的确,我们应该这样做。我们注意到有若干这样的领土近年来在联合国重大帮助下赢得了决定其未来的权利。

联合国知道它有责任强制执行东帝汶人民规划其自己命

运的主权权利。肯定地,联合国必须尽快执行两项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大会通过的有利东帝汶的八项决议。

因此,我们呼吁本委员会不仅注意我已经提到的主题,而且要紧紧地抓住这些主题,这些是联盟认为保证东帝汶民主所必不可少的要求。我们敦促委员会注意解决东帝汶问题的紧迫性并接受以下建议作为联合国将采取的措施的一部分。第一是有关停火和公民投票。东帝汶民族解放军和印度尼西亚占领军之间停火,包括东帝汶完全非军事化,应予执行,并应开始一个真正的和平进程。当这正在进行的时候,必须举行一个公平和诚实的公民投票,以决定东帝汶人的意愿。这一切都必须在联合国的直接监督下进行。

尽管联合国在执行这些措施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东帝汶人民代表性机构的观点必须给予首要的考虑。在这方面,联盟表示支持毛巴拉全国抵抗理事会起草的和平计划和其他真正东帝汶团体提出的实行自决的倡议。

第二项建议是关于释放政治犯。必须立即采取措施释放所有东帝汶政治犯。这一要求应被视为建立信任措施的一揽子的一部分。应予立即释放的人中间有毛巴拉全国抵抗理事会主席和东帝汶民族解放军总司令桑纳纳·古斯茅。释放古斯茅先生是解决冲突必不可少的。他在关于东帝汶的任何谈判中必须起直接作用。桑纳纳·古斯茅在将同印度尼西亚政府谈判的东帝汶小组中必须起领导作用。

我们的第三项建议是关于妇女状况。亚太东帝汶问题会议责成人权委员会关于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征求并听取东帝汶妇女关于对她们犯下的暴行的意见,包括诸如在东帝汶的印度尼西亚军队犯下的强奸等性暴行。同样,印度尼西亚强制推行的节育方案及其咄咄逼人的家庭计划方案应予调查。鉴于有报道说,这些计划正在被用来结束东帝汶人的人口增长,联盟对这些措施感到震惊。联合国还应调查关于这些措施是印度尼西亚的“移民”计划的一部分。根据这一计划,东帝汶人民丰富的文化和遗产将被清除。

为了实现上述建议,联合国应在其授权范围内竭尽全力,扩大进入东帝汶境内。印度尼西亚已经向人权和人道主义组织、媒介、联合国特别报告员作出这一承诺。

亚太东帝汶问题会议责成特别委员会迅速审查这些建议。还建议采取这些措施应作为秘书长向大会报告的具体内容的一部分。亚太东帝汶问题会议热切希望做到这一点后,东帝汶的冲突将在大会行动计划中得到了正面处理,以使所有殖民地人民在二十一世纪之前获得独立。那将是这个根除殖民主义十年的恰当的成就。

执行这些建议肯定是复杂和困难的。全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的领导人们的利益是这一道路上的障碍。但是,难道这不正是促进了成立联合国的那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吗?—使所有国家,不论大小、有权和无权、强弱、在世界舆论的法庭面前有平等权利。难道联合国的授权不正是以波斯湾战争期间同样的速度和关心来把国际法的全部份量施加在不肯驯服的的国家的身上?

联合国的效力在于其会员国能达成的共识。那么,很可以理解,在冷战时期决定国际和区域政治局面的超级大国角逐使这种共识成为不可能。从那时以来,世界已经重新获得了那个机会。然而,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的结束反而只是突出了象印度尼西亚这样的恶棍所造成的区域冲突。

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已经发了言。现在已是时候应在东帝汶应用非殖化宣言,联合国这两个机构的历次决议证明了

这一点。现在必须得到的是应用这些决议和《联合国宪章》给予各成员国帮助殖民地人民获得他们不可剥夺的自决权的授权的政治意愿。

然而,尽管全世界谴责印度尼西亚非法占领东帝汶,印度尼西亚顽固地坚持其对该领土的要求。它故意对联合国置之不理。它故意不理睬世界公众舆论。它故意对其邻国称王称霸,并讹诈他们,强迫它们对它的要求下跪—不,磕头。

我们不能,也不应允许这一情况发生。肯定地,象联合国和诸如东南亚国家组织这样的区域机构在侈谈和平和裁军的同时,容忍继续迫害东帝汶人是极端虚伪的。

这一悲剧还要继续多久?答案隐藏在联合国大厅的某个地方。的确,答案部分地—如果不是全部地—在于在委员会的意志。

我曾被要求宣读菲律宾声援东帝汶和印度尼西亚的一份声明,但我宁可将它作为我刚才已经发表的声明的附件提交,因为那个组织是亚洲太平洋东帝汶问题联盟的一部分。

请愿者退席。

下午1点散会

---